



■视点聚焦

# “一票难求”是因为火车票太便宜?

■靶心

春运期间,导致铁路一票难求的原因很多,但全国人大代表、北京铁路局常务副局长罗金保却有高见,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铁路票价太低。”罗金保说,多年来我国实行铁路低票价,所以大量旅客选择坐火车出行。为此,他提出建议:在适当提高铁路运输价格的同时,建立宏观调控下灵活的铁路客运浮动票价,减轻运营成本上升带来的客运压力。

(《京华时报》3月7日)

## 火车票光涨价不符合政府经济学

■第一视点

理性地来分析,通过提高价格的手段来控制客流,当然会有一定的作用,但这样的手段只适合于私营企业——既然商品服务供不应求,适当涨价既可以提高利润,又可以提高效率,符合市场经济原理。然而铁路部门是全体纳税人所供养的公益事业,所遵循的应是政府经济学,它既不能以营利为目的,也不能欺负低收入者。因此,以提高票价的方式抑制需求,是违背政府经济学原理的。

尽管罗副局长是来自铁路系统的代表,有义务提出有利于本集团的建议,但在在我看来,他的涨价建议不仅有损公众利益,也不符合公

共事业管理者的身份。火车票要涨到多少才可以缓解一票难求的局面?从春运期间,民航、公路等运输部门同样是一票难求的情形来看,铁路要想独自避免人满为患的局面,非得把票价提到飞机票之上才有可能。真要是那样话,人们肯定要问:铁路只为大款服务吗?人民建设铁路就是为了让穷人受歧视?

可见,铁路欲以涨价抑制需求,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但它却揭示了部分铁路管理者不思进取的懒惰思维。缓解春运一票难求的局面,本应寄望于铁路的改革,而铁路的改革涉及面很广,比如:打破垄断,上市融资;加大铁路网建,提高运力;加快体制改革,探索

科学、高效的管理机制,等等。但诚如公众所知,铁路部门在技术与管理方面的改革步伐缓慢,但在提高票价、控制客流等方面的管理,似乎兴趣浓厚,并乐此不疲——这一点,公众几乎每年都可以从相关官员或学者的“高论”中了解到。这显然是改革无能的表现。

因此,铁路管理者的“勇敢”,不能建立在敢于接受公众唾骂的水平上,而应当建立在技术与管理的改革之上。如果改革的思路不能跳出损害群众利益的框框,那么当个公共事业的管理者实在太容易了。遗憾的是,在国有垄断事业中,这样轻松干管理工作的人还真不少。

(樵樵)

■第三只眼

### 推行“实名购票”怎么没这么起劲?

只要火车票价低于飞机票,只要不至于挨饿,急着回家的游子该买还是要买的。提高火车票价,除了让铁路部门挣到更多真金白银,让穷人回家更难,回家成本更高以外,根本不能改变“一票难求”的现状。

何况,既然乘客能从票贩子手里买高价票,就说明“一票难求”并非是票价低惹的祸。面对“一票难求”的局面,铁路部门除了考虑涨价以外,为何不检视自身不足,改进工作,从内部挖潜呢?

就拿火车票实名制来说,在票贩子依然猖獗的情况下,尽管广大公众一再呼吁用购票实名制应对票贩子,缓解“一票难求”,而铁路部门却坚决予以了否定,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当然,在现行交通体制与运力无法大幅提升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奢望“一票难求”的春运现象马上消失,但改善春运环境还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铁路部门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狠狠打击黄牛党,增强服务意识,改进目前服务机制中不合理的部分,百姓买票方便了,铁路部门在百姓心目中的形象也会大大改观。

我最后想说的是,罗副局长希望涨价的冲动再强烈,总不能无视亿万百姓的期待吧。罗副局长不妨俯下身子看看各大网站的网友留言,听听曾在冰天雪地里排队买票的旅客的呼声吧。

(叶祝颐)

## 现代快报两会报道

江苏都市网  
www.js.cn



特别联动



■一语惊人

“电信行业不存在垄断”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对于垄断企业的职工收入过高问题表态: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比如电信行业,固定电话、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

“微软说,我也不是桌面操作系统的垄断,桌面操作系统还有Linux呢,怎么能算垄断?”

——一名网友回应王瑞祥的“非垄断说”。

“这是左手与右手的竞争”

——另一名网友则如此回应。

“重建圆明园就是一个圈钱圈地的商业炒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化研究院院长张廷皓说,圆明园代表了中国当时造园艺术的巅峰,真实性和完整性是文物保护的最根本的要求,再造也是不真实的,现在真正该做的是把没有遗址的环境保护好。

“春运混乱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这要说明白,为什么要气象局道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气象局局长郑国光面对网友“气象预报不及时导致雪中春运困局”的质疑时反问记者。

“道啥歉,预告明天天晴难道就得表扬啦”

——网友回应郑国光的“不道歉论”。

“应该是老百姓向官员们道歉,没做好防灾准备,给领导们添麻烦了”

——另一网友如此回应。

“按CPI变动调整社会保障对象和低收入者补贴,随上一

季度CPI的平均值予以调整”

——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表示,国家可以采取减税来减弱CPI上涨的影响,但这对社会保障对象及低收入者作用甚微,因为他们不纳税,因此减小对他们影响的途径就是直接增加补贴。

“北京房价出现拐点可能性不大”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建设控股集团总公司总裁于炼说,房价拐点是否出现有一个重要因素,即地价是否出现拐点。而地价是否出现拐点、是否暴涨暴跌,市场因素比较少,政府因素比较大。

去年,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买卖过程中获取了一定好处,他们通过土地出让金,已经储备了相对雄厚的财政实力。如果不能保证财政实力稳步增长的话,对于政府来说是痛苦的事情,这种痛苦政府是不愿意看到的。因此这个拐点不容易出现。

“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越来越明显”

——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林毅夫建议,应当大力发展中小银行以及担保公司,让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样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格局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

“驾辕之马首超拉套之马”

——2007年,消费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7年来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消费、投资、出口“三驾马车”中贡献最大的一项。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教授贺强对此作出了形象的比喻。

“文化事业也要吃‘低保’”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化厅副厅长李修松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文化投入严重不足,应该建立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文化事业基本保障制度。

## 涨价视角下的“铁路开放建设”

■第二落点

不想骂人,但不骂总感觉对不起自己的嘴巴。按照这位副局长大人的逻辑推论下去,那就是:大家之所以看病难,根本原因在于看病费用太低,要是价钱高得吓人,医院外面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排队了;中国之所以有住房难问题,根本原因在于房价太低,要是每平方米100万,也就没那么多购房压力了……依照这个伟大发现,中国哪还有什么民生困境?一朝涨价,困难全消!这番论调的荒谬程度跟那个劳什子的“钉子户令房价高涨”简直不相上下。也难怪网上调查有90%的网民选择“坚决反对”。

罗副局长可能想不通:凭什么这话说不得?政协

委员张茵接连提出“应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降低富人税负”等三个为企业家、富人代言的提案,虽然有人质疑,但还有相当一部分人给予了理解,甚至说这是张茵正常的民主权利,而到了铁路局这里,为什么就非法免于挨骂了?道理其实很简单:性质的不同决定了同样的“利己”语言,会被同样地对待。

张茵的造纸厂再富有,也只是一个私营企业,正如茅于軾先生所言,在政府公权力面前,仍然属于“弱者”,他们的特点决定了有向政府“哭着要糖”的权利,两会也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铁路则是一个特殊的公共服务部门,公共性是它的首要特性,绝对垄断是它当下的

基本特点,而这两点又决定了它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不能“全心全意为人民币服务”。

人民有回家过年的传统愿望,铁路部门只能兢兢业业提供服务,岂能盘算着如何阻止?更何况,中国的铁路不是发展得很好,而是发展得很差。有数据显示,中国铁路只有7.6万公里,路网密度为每万人0.58公里,仅为加拿大的3.5%、美国的10%,世界排名百位之后,造成这种发展迟缓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高度的垄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日前表示铁路建设将向外资开放的消息,恐怕比提高火车票票价对中国的铁路发展更有意义。

(毕诗成)

## 公民迁徙权还要分三六九等?

■两会热评

全国人大代表、公安部副部长白景富表示,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大中小城市肯定会有区别。白景富说,户籍制度肯定是要改的,但大城市与小城市肯定有区别。他进一步解释,北京、上海、天津和其他大小城市肯定不同,省会城市又和其他城市不同。

(3月6日《京华时报》) 为支持“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的政策,白景富反问:“北京现在人口近2000万,若再放2000万人成吗?又如石家庄、郑州等已上千万人口,放开成吗?”产生这样的担忧实际是因为只看到了事情的一面。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生活成本非常高,外来人口要能在这些城市扎根并非易事,放松户籍管制后,不少人即便来到这些城市,依然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后选择离去,大城市的人口数量依然能够保持一种动态的均衡。

无论是从白景富此次“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

切”的表态,还是就大多数城市的一贯做法来看,中国城市户籍管理更多秉承的是一种行政管制思路,而对市场化对于人口数量与分布的调节作用视而不见。其实,人们迁徙都是为了能活得好,所以他们会自己做出理性的判断,市场化调节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人口配置的作用,所以,在户籍管理中应当更多地使用市场化调节手段,而减少行政管制手段的使用。更重要的区别还在于,行政管制必定要以损害公民自由迁徙权为代价,反之,更多地使用市场化调节手段,不但人口数量与结构能够随时得到动态调整,公民的自由迁徙权也能得到更大的尊重。

“户籍制度改革不会一刀切”,言下之意就是小城镇户籍管理放松,而大城市户籍管制依然从紧。这样的“非一刀切”,显然会造成公民自由迁徙权的分割,而平等之自由迁徙权,不恰恰是宪法赋予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吗?

(魏文彪)

## “学前义务教育”该有时间表

■两会热评

教育部正在研究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如果成功推行的话,义务教育的时限将有望延长至13年。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教育部副部长、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赵沁平昨天透露的信息。

(3月7日《新闻晨报》) 我们很喜欢将各种教育都从娃娃抓起,比如廉政教育、禁毒教育……但却将“学前教育”拒之于义务教育的门外。而真正最应该从娃娃抓起的,恰恰是“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有多重要,不必多说,可为何将“学前教育”拒之于义务教育的门外?说到底,是教育投入不够所致。由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使得“学前教育”存在着巨大的反差。有钱的家长将子女送入天价幼儿园,一年仅学费就10万,而许多没钱的家长只得将子女放任自流。特别是那些家长外出务工的“留守儿童”,他们

只能跟着年迈的爷爷奶奶,过着“自由”的生活。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些孩子一开始就已经输了一大步。

由于“学前教育”没有纳入义务教育,各种各样的幼儿园层出不穷、良莠不齐。更重要的是,这滋生了乱收费。现在读书最贵的恐怕除了大学,就是幼儿园。在我们这里,读中小学免费,而读幼儿园却交不菲的学费。许多小学都办有幼儿园,其不肯放手,因为这是一块大蛋糕。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教育发展的不均衡,这是现实。但我们政府有责任让孩子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教育的公平是最大的公平,教育的公平自然也包括在幼儿园的教育上。教育事关祖国的未来,每一个孩子都是我们国家的希望。因此,把“学前教育”纳入义务教育意义重大,政府应有明确的时间表。

(王军荣)

## 请在阳光下审批平安再融资

■他山之石

在中国资本市场上引起轩然大波的中国平安再融资方案,已经在3月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获得高票通过。按照规定程序,中国平安的这个方案还要经过中国证监会的审批才能实施。现在,投资者关注的目光已从中国平安转到了证监会,证监会是否会批准这个“巨无霸”的再融资方案,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答案。

但证监会在此之前已经适当回应了市场对此事的关注。证监会新闻发言人2月25日发表的谈话中说:“目前,中国平安的融资方案仍处于履行公司内部法定程序阶段,尚未向监管部门提交融资申请。在该公司向我会正式提交融资申请后,我会将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依法审核,督促公司强化信息披露。”证监会副主席范福春日前在出席全国政协会议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已表示,证监会将严格审核其融资方案。

一个公司的再融资方案,引起市场的高度关注,不仅需要证监会出面表态,甚至引起了正在召开的全国两会的热议,中国平安可以说是开了一个先例。

我国股票发行以及上市公司再融资虽然经历了从审批制到核准制的改革,但这种改革是不深入的,一个公司获准上市或者被拒绝上市,审查机关依据的标准是什么,在投资者看来并不是很清楚。

这种制度安排已经越来越

不适应资本市场发展的需要,也容易埋下“权力寻租”的隐患,前几年爆出的王小石案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而据最新出版的《证券市场周刊》报道,在去年底上市的过程中,存在着包括违规上市、内幕交易等重大嫌疑。出现这样的问题,显然是因为审核不够透明所造成的。

只要把整个审核过程放到阳光下,彻底透明化,让这个过程能够接受市场舆论监督,那么,一切不合法或规范想蒙混过关的都很难得逞,这不仅有利于资本市场的健康,也有利于维护证监会的清誉。因此,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来看,目前在新股发行、再融资等方面的制度安排都有进一步改革的迫切需要。

而中国平安的再融资申请正好为这种改革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应该看到,尽管中国平安的再融资方案在股东大会上获得了高票通过,但这个事情已经不仅仅是中国平安自家的事,而是牵涉到整个市场的利益。因此,如果证监会仅仅是履行一下程序,简单地作出核准或不核准的决定,都是不够慎重的。我们更希望证监会能够将此作为范本,把对中国平安再融资的申请放到阳光之下,向市场充分说明核准或者不核准的理由。果真如此,不管它作出的决定是什么,都可以起到让市场上绝大多数人满意的效果。

(作者周俊生 原载3月7日《东方早报》)